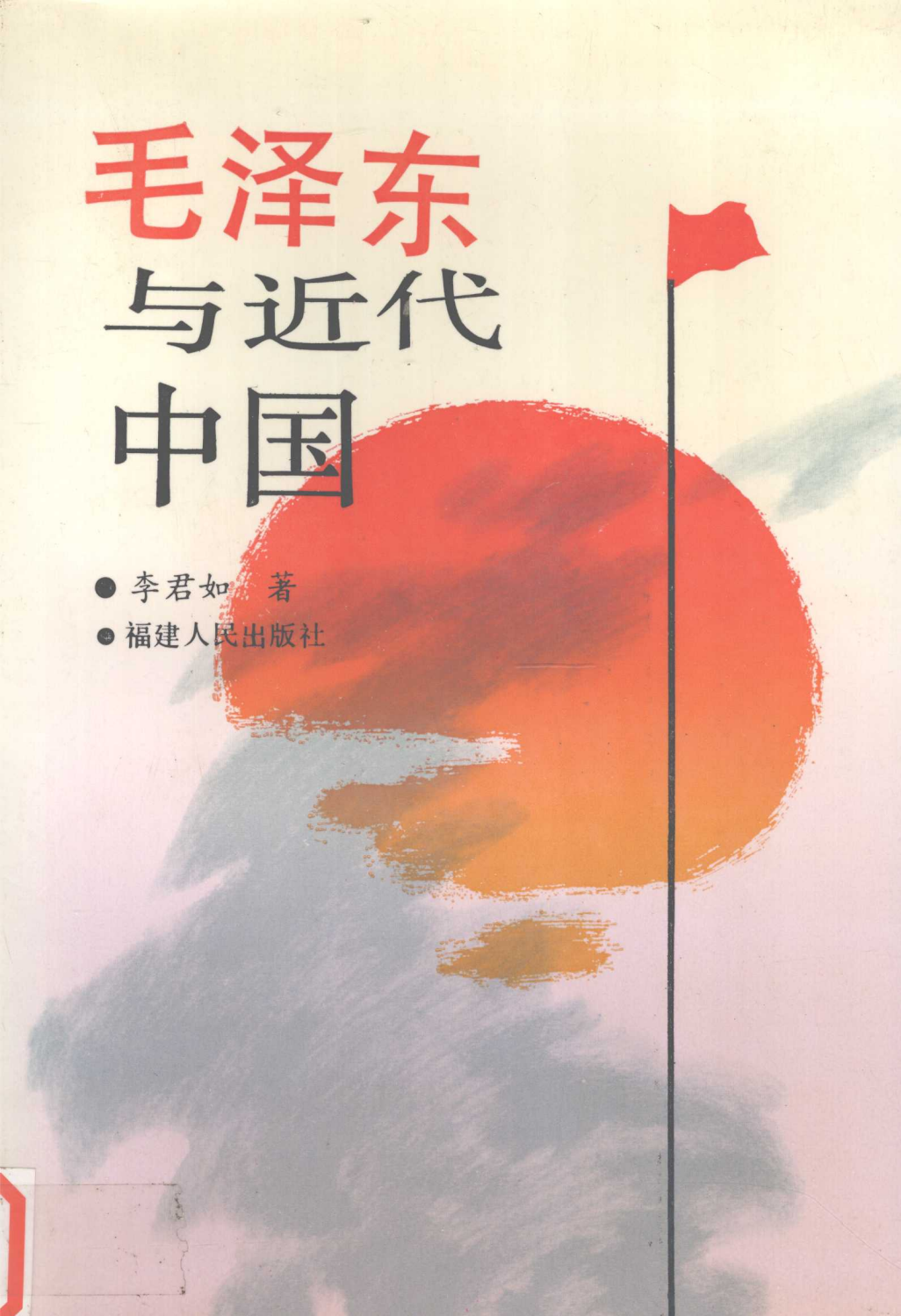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与近代 中国

● 李君如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A755
L185:1

A755
L185:1

毛泽东
与近代
中国

● 李君如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年·福州

(闽)新登字01号

毛泽东与近代中国

李君如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5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印张 4 插页 354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11-02224-8

D·165 定价: 12.60元

装帧设计 施珍贵
美术编辑 池民海
责任编辑 李天兵

序 言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君如的新著《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出版了。这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已经读过他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要求进一步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读者们，可以说是一个大喜讯。

我幸运地应邀作序，并成为先后两部著作的第一个读者，这使我获得了争取最早发现一点什么的机会！

果然，当我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读了两遍之后，就发觉，她们都是在极丰富的资料基础上，采用历史考察与辩证分析相结合的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颇有深度、颇有独到见解的论著。再经反复思索，我就发现：原来她们是一对既各自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相互贯通着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关系到我国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的指导思想的科学论著的姊妹篇。

诚然，对于掌握和贯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基本的或主要的经验教训，君如已经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的第八章中作出了五点简明扼要的总结。就在这个总结中，君如认为：

第一，对于“实际”，必须力求全面地去把握。绝不可片面性地去把握，也绝不可割断历史地去把握。

第二，对于“理论”，必须竭力去把握其中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即马列主义哲学最基本的理论精神），而不可满足于词句的背诵。还必须时时提高警惕，竭力防止那种源出于我国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极端偏执的社会心理倾向的风浪对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干扰！

第三，对于“结合”，必须努力做到使理论和实际在内容实质上的结合，即表现为哲学基本理论精神同具体科学相结合，并同文化遗产中的科学精华相结合。同时，还得竭力防止生硬地把哲学原理套用到种田、做工、打仗等上去的形式的“结合”；更须防止用寻章摘句来为自己行为作辩护，或为自己所贩卖的伪劣货色当“招牌”的实用主义的“结合”。

第四，在“结合”或“联系”的过程中，必须十分明确，是双向地起作用，而不是单向地起作用的。这就是说：一方面，理论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切莫忘记，还有实践对理论起检验作用、校正作用和促进作用。

第五，还必须特别注意，实践与实际，也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绝对的统一。因此，我们不但在讲道理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且在实践活动时，更应加强调查研究，务必做到：从实际出发！

君如的上述观点，我个人是完全同意的，并且认为他确实是总结得相当深刻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读者纷纷表示赞赏，甚至有些读者还为此而鼓掌喝彩！但是君如好像没有听到似的，只顾自己埋头于《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的写作之中。这是因为君如早已心中有数；在他看来，在广大读者之中，对他所指出过的那五点，真正具有深刻理解的读者，毕竟只有一小部分。这是因为上述要点立论的根据并不仅仅在于新中国开国以来40多年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在于旧中国沦为血迹斑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140多年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未曾探索过，

甚至尚未接触过如此漫长的历史事实和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人们确实是很难理解君如的上述观点的。

就拿君如提出的“第二点”，即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力求吃透它的精神实质，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一点来说吧。当着今天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伟大国家——苏联遭了解体的厄运，而同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伟大国家——中国却仍然顶着狂风巨浪奋勇前进。在这种惊心动魄的国际大气候下，我们就得像君如在《毛泽东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去对我国1840年至1921年这段历史时期，去对林则徐到孙中山等志士仁人，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一方面诚心诚意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们虚心学习，一方面前仆后继地同西方资产阶级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经验教训进行重新考察和研究；并且还更着重研究和总结我国从1921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接受并运用由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列主义这一犀利的理论武器，逐渐认清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必然前途和必由之路以及在战斗前进中必不可少的战略步骤，特别是毛泽东及其战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的被称为“三大法宝”的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重要方面的显然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从而使 we 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镣铐，对这段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及深刻的经验教训，进行更细致的重新考察和更深入的研究。我想，在当前的情况下，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加深对上述“第二点”，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的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们再拿“第三点”，即君如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极严格的科学要求这一点来说吧！他认为，必须力求做到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实践中产生并经实践证明过的，被君如称为“宏观社会科

学”的理论学说，例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列主义原理指导下，去重新认真考察中国历史，特别是认真考察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那我们就可以加深对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真正科学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可以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成熟和发展这一过程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毛泽东与近代中国》一书的问世，是君如对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献礼。我确信，广大读者若能将《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同她的姊妹篇联系起来阅读，不仅会有助于增强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而且还一定会有助于增强对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的。

周 抗

1993年10月

目 录

序言	周抗 (1)
引论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的胜利”	(1)
第一节 太平洋彼岸：“丢失中国”的振荡	(1)
第二节 东亚大国：“站起来”的喜悦	(8)
第三节 理论指南：新民主主义理论	(13)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与出路的选择	(21)
第一节 基本问题：救亡与发展	(21)
第二节 从魏源到孙中山：中国向何处去？	(37)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的选择	(51)
第二章 国情分析论	(84)
第一节 逻辑的起点：国情分析	(84)
第二节 阶级结构	(98)
第三节 主要矛盾	(126)
第三章 革命战略论	(131)
第一节 从一个纲领到两个纲领	(131)
第二节 两个纲领的认识误区之一：“两次革命论”	(134)
第三节 两个纲领的认识误区之二：“毕其功于一役”	(136)

第四节	“两步走”的革命发展论	(141)
第四章	革命道路论	(156)
第一节	寻找道路：从民众运动到武装斗争	(156)
第二节	寻找道路：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 包围城市”	(162)
第三节	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170)
第五章	统一战线论	(174)
第一节	国情与统一战线	(174)
第二节	政治基础论	(179)
第三节	领导权论	(185)
第四节	策略论	(188)
第六章	党的建设论	(195)
第一节	国情、党情与党建	(195)
第二节	党内斗争论	(200)
第三节	党的“四大建设”	(210)
第七章	民主政治论	(228)
第一节	“新民主”社会	(228)
第二节	民主政权论	(237)
第三节	党政关系论	(259)
第八章	经济建设论	(264)
第一节	发展的选择——新民主主义经济	(264)
第二节	资本主义命运的思考	(272)
第三节	从“耕者有其田”到合作化	(281)
第四节	经济建设构想	(301)
第九章	文化建设论	(325)
第一节	救亡与发展的呼唤，新文化	(325)

第二节	革命文艺论	(336)
第三节	人民教育论	(352)
第四节	知识分子问题得失析	(374)
第十章	哲学论	(385)
第一节	“结合”的哲学	(385)
第二节	哲学研究与党的思想路线	(401)
第三节	实践规律的探索	(429)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	(440)
第五节	毛泽东与斯大林哲学的关系	(453)
参考文献书目		(463)
后记		(464)

引论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的胜利”

虽然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几亿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要求，中国向进步的方向演变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中国如果没有产生毛泽东，我们很怀疑中国的革命和建国会如此迅速、全面、成功。

——〔美〕何炳棣

第一节 太平洋彼岸：“丢失中国”的振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被国外学者称为“毛泽东的胜利”。

当胜利的旋风横扫残敌、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也引起了太平洋彼岸的振荡。中国革命的胜利，无庸讳言，是一件世界性的大事。美国学者伊·卡恩在《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在中国革命胜利的背景下，美国发生

的“麦卡锡事件”。这个荒唐的政治冤案，极好地反衬了中国革命胜利在世界各地的强烈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盟友，美国曾有20多名“中国通”出任外交官到中国工作。“但是，在战胜日本后的15年里，即毛泽东在中国取代蒋介石以后的11年里，外交官中其余的‘中国通’都被调走或撵走，他们不得参与重大的对华事务了。理由是，‘丢失’中国，他们要承担一定的责任。”^①从此，“中国的丢失，成了美国外交神话中的被人念念不忘的事，以致于后来联系共产党的成就时，常常要老调重弹。”^②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是美国对中国的“丢失”，并因此在美国统治阶级中引起恐慌与振荡，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似乎中国人民没有权力与权利来主宰中国的命运，只能顺从美国的控制。这种“丢失”中国之类的想法本身就暴露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特征。然而，在当时，它却在美国成为一种占主导性的思潮与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参议员麦卡锡等声嘶力竭且蛮横地提出要追查“丢失”中国的责任者，对驻华外交官，尤其是一些“中国通”的专家，进行了所谓“忠诚”审查和此起彼伏的指控，在全美上下形成了一股歇斯底里般的反共反华浪潮。这就是史家所称的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事件”。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内就在酝酿制定新的对华关系政策。年轻的“中国通”戴维斯1944年1月15日在给史迪威将军的信中写道：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

^{①②} [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第12、13页。

·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活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因此，蒋委员长自然要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①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戴维斯的基本立场是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出发，遏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但是其对策之一就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封锁与消灭中国共产党以防上我们“依附俄国”，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同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主义展开斗争。经过一系列的磋商，美国向延安派出了以包瑞德为团长，包括“中国通”谢伟思在内的观察小组，开始了美籍学者费正清后来所说的“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的正式接触”。谢伟思在发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以观察小组看到的实际情况指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经过一个私营企业阶段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

① 转引自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第90页。

个党也就值得我们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①

蒋介石对史迪威将军及其领导下的这一切工作极为不满，要求美国政府调离史迪威。1944年9月6日，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到了重庆。不久，赫尔利就向罗斯福报告：“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蒋介石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项建议，只有对史迪威的任命是个例外。”^②显然，赫尔利的观点代表了美国政府内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另一种观点：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执政并统一中国。1944年11月17日，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加强了这一派的实力。尽管如此，在美国，驻华的外交官们仍有许多“中国通”持相反的观点。1945年初，谢伟思等直接给美国国务院呈送报告和急信，强调不仅要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还要同共产党方面合作，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政策是希望这样的合作。对此，赫尔利极为恼火。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当时在制定对华关系政策时遇到了一个难题：究竟如何对待中国政治舞台上两个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处理这一难题时，出现了对立的两种主张。尽管这两种主张都强调要维护和发展美国在华的利益，遏制苏联在中国及远东的影响，但是两派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仍有明显的分歧。

实际上，最终占上风的是以赫尔利为代表的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这一派的观点（尽管赫尔利后来为马歇尔所取代），而且，正是这一派的观点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恃无恐，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发动内战，实施法西斯独裁统治。因此，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并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

①② 转引自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第101、115页。

国家被强烈地震撼了！首先，他们没有想到用庞大的美元和先进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会败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下；其次，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口通商以来，在中国攫取到的地位和利益，将伴随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而失去；最后，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更加痛苦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共产主义运动在远东与全球突破性的进展，甚至主观地认为它意味着苏联势力在全球的扩张。这种情况，如同费正清描述的：

在十年期间，美国公众把自由中国理想化了；那时，原子时代、间谍活动和冷战结合在一起，加剧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让自由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①

正是这种“恐惧”感，加上朝鲜战争与美国大选等复杂因素，以追究“丢失中国”的责任为由，“揭开了麦卡锡时代的盖子”（费正清语）。

1950年新年伊始，美国上下充满了疑共反共的气氛。希斯伪证案、富克斯间谍案等一个个大案使“美国公众经历了一阵反共歇斯底里”。他们不仅疯狂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员，而且蛮横地在美国政府中寻找“亲共”分子。2月9日，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地方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里发表演说，骇人听闻地说：“我手里掌握着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党员，但是，他们现在却还在国务院里工作，而且做着决策工作。”并且直接点名指责“中国通”谢伟思曾经“以明确无误的话说：‘共产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希望’。”2月12日，他在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第252页。

内华达州一个地方举行的共和党庆祝林肯诞辰的集会上，再次发表演说，把谢伟思在中国任外交官的活动作为“跟共产党发生关系的具体例子”。麦卡锡的指责，迫使美国国务院在2月22日通过一次决议：“调查国务院里是否有对美国不忠诚的雇员”。这场关于“忠诚”问题的调查，后来发展到“安全”问题的审讯，即怀疑许多“中国通”是共产党渗透在国务院的间谍，进一步发展到对他们本人与家属的政治迫害和株连，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假案。20年后，随着尼克松的访华，谢伟思重新出现在美国国务院富兰克林大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并受到与会者长时间的起立欢呼。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将近1951年年底，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驻外处官员都已陷入忠诚和安全问题的麻烦之中，都受到国会委员会的攻击。这些人包括柯乐布、戴维斯、埃默森、卢登、梅尔比、费希尔、斯普劳斯、弗里曼、文森特和我。有的已受到正式的指控，进行正式的审讯，有的还在‘讯问’阶段。越来越清楚，这‘讯问’阶段只是走向更严重的指控的第一步而已。”^①事实上，除了这些外交官以外，在“麦卡锡事件”中，遭到株连与迫害的还有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专家。费正清在他的对华回忆录中，追述了他如何受到“麦卡锡事件”株连与迫害，并与之作斗争的。他说：“‘丢失中国’从字面上说是可笑的，但它从美国公众的心理上说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在麦卡锡以后的那些年里，有关中国的问题被弄得像令人恶心的食物一样已无人问津，连狗见了恐怕也要掉头作呕。然而麦卡锡时代给我们留下的都是些说起来一钱不值的东西，不管你听信哪一方面结论都是如此，要么到处都是背叛，要么到处都是不公正。与此同时，由于无知的禁忌，连‘中国通’也不能过多地谈论中国问题。”^②

① 转引自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第276页。

②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上海），第406、429页。